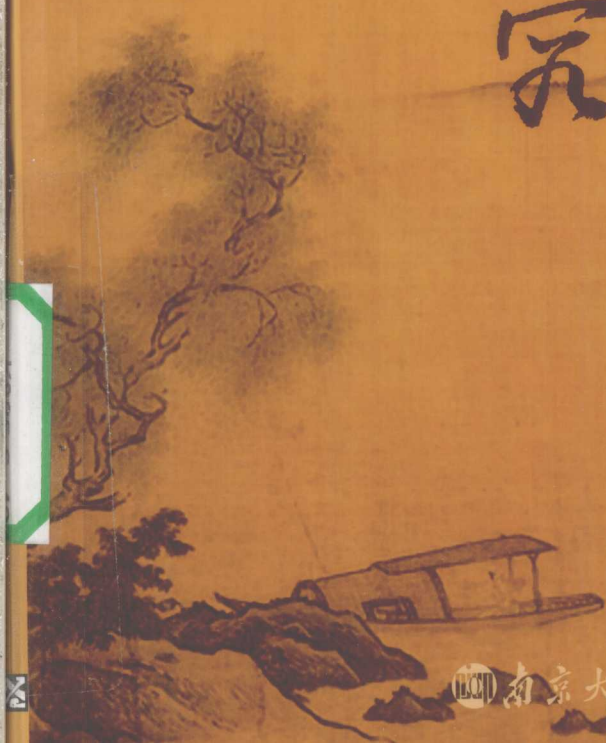




BAIJU
SHENG CUN ZHE XUE
BEN TI YAN JIU

白居易 生存哲学 本论研究

肖伟韬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BAIJUJI
SHENGJUNZHEXUE
BENTI YANJIU

白居易 生存哲学 本体研究

肖伟韬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居易生存哲学本体研究/肖伟韬著. —南京:南京大

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305-06579-8

I. 白… II. 肖… III. 白居易(772~846) — 人生

哲学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9521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白居易生存哲学本体研究

著 者 肖伟韬

责任编辑 王抗战 陈 娟 编辑热线 025-8359699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人文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 字数 252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579-8

定 价 27.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走进中唐,接近白居易,迄今已有六七年时间了。记得2002年,刚考上研,师从曾志华先生,甫开学,先生就给我们布置任务,要求我们各写一篇论文,作为学期作业。因缘巧合,我选择了元稹作为研究对象,拟题《元稹“巧婚”“巧宦”辩》,经过几个月的阅读思索,终撰成文,没想到,论文既出,得到了先生的大加夸扬。现在回头再看,这篇论文实在稚嫩,大有当年文章今来悔之慨,但就当时的心境来说,先生的揄扬,还是极大增强了我对专业的兴趣和信心,由此也开始了我真的古典文学研究之路。

但是,当我对元稹作进一步研究的时候,阅读趣味却不知不觉发生了转移,开始对白居易产生了难以排抑的兴趣,并把白居易作为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经过一年多的阅读,反复揣摩,确定研究白居易的生存哲学。在此基础上,经数月集中撰写,最终完成《白居易生存哲学简论》硕士学位论文,篇幅约八九万字。论文答辩前,经过唐代文学研究界著名学者阎琦先生、马歌东先生(马先生随后成为我的博士生导师)、杨恩成先生、李志慧先生的评阅,一致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尤其是阎琦先生,作为论文答辩主席,他对我的论文大加赞赏,认为我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型”,并对我四处称赞,这对于一位刚刚踏上学术之旅的年轻学子来说,潜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不过,遗憾的是,之后就再也没有和阎先生联系,恍惚之间,已时隔数年,但我对先生的赏识之恩却没齿难忘,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继续进行古典文学研究的无限动力。我时刻告诫自己,一定要勤奋刻苦,用更好的成绩来回报各位先生的厚爱。

事实上,把白居易生存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原初的考虑很简

单,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就白居易而言,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传统文化士林中深具影响的一位重量级的士人。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用其独特的吟唱方式,关注自我,体验人生,感慨命运,抒写政治,玄想宗教,洞察宇宙,反思文化……可以说,白居易以一个诗意士人的身份属性,给他的生存哲学涂抹上了绚丽的个性色彩,同时也深刻地沾溉了后世士林,后世诸多著名的士大夫,或学习,或效仿,或推尊,或顺从……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可见,从这个层面而言,研究白居易的生存哲学,不再是其一身之研究,同时具有了类的意义,对整个传统士林文化的研究均有相当的认识意义,可谓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这个初愿,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白居易生存哲学综论》的盲审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同行专家的认可。李小荣先生认为:“如此不唯有助于白居易思想的研究,对推进中唐文人生态及文化生态的研究亦有启示和先导之用”,许多观点“迄成定论”。尹占华先生认为:“关于白居易的人生哲学他人也时有涉及,但都不及此论文发掘之深、开拓之广。”王玫先生认为:“无疑对白居易之人格生活及诗文创作都获得了一个新的观照视角。”邓小军先生认为:“论文专门讨论白居易生存哲学,选题具有较重要的意义,因为白居易生存哲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其自身为唐代大诗人而已”,“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成果扎实厚重”。导师马歌东先生也认为“堪为一家之言”。

其次,就自身而言,研究白居易的生存哲学,从某种程度而言,是为了解决自我精神困境的需要。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对知识的渴盼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从上中学起,就喜欢思考一些历史、哲学、文学教科书中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喜欢把这些从书本上获知的知识与现实的生活环境相对应,总是奢望找出一点什么联系来。后来上了大学,有了一个较大的图书馆,除了看中国经典名著外,我也喜欢读一些尼采、叔本华、康德、海德格尔等西方哲人的经典著作,反正当时是读得云里雾里,不求甚解,似乎无甚收获,但潜移默化,却于无形中培养了自己喜欢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诠释人生,认知世界。这种思维模式的表现,我用《白

居易生存哲学综论》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作了一个肤浅的尝试。而即将出版的这部著作,则是我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三个部分的改编,由于它们都关涉白居易生存哲学自身,故名《白居易生存哲学本体研究》;而其他三个部分,则暂略过不载,以待时机成熟,再作安排。

是为序。

肖伟韬

2009年8月31日

目 录

- 1 · 引论:一个漫步在儒释道文化丛林中的俗世“精灵” · 5
- 12 · 第1章 白居易生存哲学与儒家思想 · 12
 - 13 · 第一节 《中庸》、《周易》与白居易中和圆融思想性格的形成 · 13
 - 25 · 第二节 《论语》、《孟子》对白居易儒家人格的影响和浸润 · 25
 - 33 · 第三节 “世敦儒业”及中唐思潮转型与白居易经世品格的形成 · 33
 - 38 · 第四节 《礼记》、《诗经》与白居易早年的诗学思想及为政理念 · 38
- 49 · 第2章 白居易儒家生存哲学的两次转折与三个阶段 · 49
 - 51 · 第一节 “出贬江州”之前的人生早期 · 51
 - 55 · 第二节 “出贬江州”与“退居洛下”的人生中期 · 55
 - 62 · 第三节 “退居洛下”的人生晚期 · 62
- 71 · 第3章 白居易生存哲学与道家思想 · 71
 - 71 · 第一节 《老子》、《庄子》与白居易知足、适性思想的形成 · 71
 - 87 · 第二节 道风盛行的时代习气对白居易道教信仰的刺激和导入 · 87
 - 100 · 第三节 魏晋风流对白居易诗酒琴棋生活情趣的影响 · 100
- 110 · 第4章 白居易道家生存哲学的曲折之途与超越之路 · 110
 - 110 · 第一节 道家生存哲学的曲折之途 · 110
 - 118 · 第二节 道教信仰危机的超越之路 · 118
- 123 · 第5章 白居易生存哲学与佛、禅思想 · 123
 - 124 · 第一节 佛、禅盛行的时代思潮对白居易佛、禅信仰的影响 · 124
 - 130 · 第二节 从思维模式、梦幻人生反观白居易所受佛、禅经典的影响 · 130
 - 137 · 第三节 《维摩诘经》对白居易居士人生选择的直接导向 · 137
- 145 · 第6章 白居易佛、禅生存哲学的三层境界 · 145
 - 147 · 第一节 佛、禅生存哲学的理论兴趣层 · 147

151 · 第二节	佛、禅生存哲学的功利实用层	
154 · 第三节	佛、禅生存哲学的虔诚投入层	
162 · 第 7 章	白居易生存哲学的独特性考察	录 目
167 · 第一节	“中人”与“中隐”	
180 · 第二节	“达则兼济”与“穷则独善”	
187 · 第三节	“儒者”、“文儒”与“文士”	
205 · 第四节	对“才”、“时”、“名”、“位”与“命”之关系的省察	
220 · 第五节	“世间”、“超世间”或“出世间”的不即不离	
234 · 第六节	“思乡”与“恋阙”	
254 · 第七节	“乐可理心”、“酒能陶性”与“诗以申怀”	
267 · 参考及引用书目		

引论

一个漫步在儒释道文化丛林中的俗世“精灵”

人,作为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正如西方哲学家卡西尔所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①但是,作为历史中的人,并不是每个人对当下生存状况的审视和查问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都可以成为可供后人追索历史的线索。历史往往只把这个戴着光环的使命,交到为数极少的知识精英手中。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唐伟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样一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深深足迹的思想者和存在者。他不仅每时每刻都在查问和审视自身的生存状况,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作了充分的关注和批判,而且还用他的生花妙笔,生动而完整地记录了他自身的生存状况。这就为我们研究和还原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特别是白居易自身的生存状况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同时也为我们考察其生存哲学提供了一幅十分生动而又丰富的画面。鉴于此,我们通过对白居易个体生存哲学的立体考察,肯定会有新的发现与收获。因此,研究白居易的生存哲学,就不但是一件必要的事,而且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了。

通过对白居易生存环境的还原,我们知道,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传统儒家的古典音调不单为佛教的精神阴影所遮掩,而且为道教的浪漫色彩所平衡。因此,生活在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的中唐社会,当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10页。

白居易戴着儒家的帽子、穿上道家的袍子、拖着佛禅的草鞋漫步在中古社会的文化丛林时,他便以特有的步调和人格范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白居易这种生存范式的形成,不仅外在的文化环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与白居易积极主动地拥抱人生、体验人生与创造人生也是密不可分的。白居易作为“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缙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白居易集笺校》,下同,卷第四十五,《与元九书》)这样一位由单寒之族而成长起来的封建士子,尽管早年生活充满了颠沛流离、艰辛困苦^①,但应当承认,因在科场文化中摸爬滚打而成长起来,他的早年生活应该主要是在书斋中度过的,或者说主要是以书为伴的。^②可见,白居易生存哲学思想的最早来源,固然有来自现实生活的某些感性经验,但更主要的

① 正如以下诗歌所言,如《适意二首》其一:“十年为旅客,常有饥寒愁。”(卷第六)《续古诗十首》其五:“栖栖远方士,读书三十年;业成无知已,徒步来长安。”(卷第二)《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寄上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邳弟妹》:“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卷第十三)《将之饶州江浦夜泊》:“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卷第九)《短歌行》也是如此:“闻君少年日,苦学将干禄。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读。布衾不周体,藜茹才充腹。”(卷第二十九)而《伤远行赋》则非常具体地记录了白居易早年生活的艰辛:“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阳而归洛阳。……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凉风夜而忧伤。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测而可量……独展转而不寐,候东方之晨光。虽则驱征车而遵归路,犹自流乡泪之浪浪!”(卷第三十八)这些诗歌对白居易早年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了如实的记录。

② 这从他自己的描述和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悲哉行》:“悲哉为儒者,为学不知疲。读书眼欲暗,秉笔手生胝。”(卷第一)《及第归觐留别诸同年》:“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卷第五)《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眼为看书损,肱因运笔伤。病骸浑似木,老鬓欲成霜。”(卷第十五)《代诗书一百韵寄微之》:“光景嗟虚掷……攻文朝屹屹,讲学夜孜孜。”(卷第十三)出贬江州后作的《与元九书》对这段艰苦的读书生涯仍是不能忘怀:“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谳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卷第四十五)诸如此类的诗文,都是白居易早年书斋生活的形象描述。

是来自对传统经典文本的诵读、理解、吸纳和运用。正是早年的苦学过程,为之后白居易对自己的生存状况作出理性分析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理论资源。换句话说,白居易之所以让人感觉到如此充分地存在过,或者说他是如此充分地论述了自身的存在,就是因为有极为丰富的理论资源为他提供反思和表达的能量。因此可以说,恰恰是传统经典文本造就了白居易最早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进士试的十年期间,科举考试的严格程序、高标准要求(对传统经典文本的娴熟及灵活运用程度),都使白居易的思维得到了极为精细的锻炼和培养,从而使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基本趋于定型和成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白居易中晚年处世哲学的形成,虽然受到了佛、禅思想的深刻影响,但主要与白居易早年就表现出来的这种思维模式及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逻辑关系,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客观公允的。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白居易应进士试时辞赋创作的用典情况及思想内容来充分地考察他对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娴熟程度及理解深度。反之,我们也可以从白居易对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熟悉程度以及深刻体会,来分析它们对白居易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定型的深刻影响。

如所周知,唐代的科举考试,尤其是到了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进士科考试以考察诗赋为主。^①关于到底是科举考试促进了诗赋创作的繁荣,还是诗赋创作的繁荣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及诗赋是否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当今学术界有不少争议。例如,程千帆认为:“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

^① 据日本学者冈村繁所言,律赋写作最盛的时期是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代,即从代宗大历(766—779)年间至文宗大和(827—835)年间的六十年间。(《唐代文艺论·白居易研究》,第105页)。

发展的契机来说,或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①其后,傅璇琮进一步作出论断云:“人们往往有个误解,以为进士既称文学之科,那就是试诗赋,于是就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实际情况恐怕倒是相反。在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进士考试是与诗赋无关的。”并云:“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而且,我们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还对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消极作用。”^②另外,陈飞在对唐代试策进行考述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云:“试策是所有科目不可少的试项;试策是所有时段必不可少的试项;试策在所有的试项里面地位最为重要和关键;试策往往是唯一的试项等。”^③李浩在其著作《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专列一章《“诗赋取士”说平议》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并得出“‘诗赋取士’的提法既不全面,又不准确,但这一说法来自:‘……文学求新逐异,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唐代诗赋文学既有社会批判,又有道德关怀,诗文中保存了哲学的良知’等七条结论。”^④

但不管怎样,以考察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进士科考试最终演变为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要的正途,成为左右士子们仕途荣达与否之关键所在,因而成了士子们最为艳羡的梦想^⑤。关于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不论

①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88页。

②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

③ 具体参见陈飞《唐代试策考述》的相关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02。

④ 具体参见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相关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02。

⑤ 有关进士考试在唐代的基本情况,可参考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陈飞《唐代试策考述》、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等著作的相关论述。此外,就科举考试与文学的关系,李浩还作了史的纵向考察,他说:“如果说,从‘关中本位政策’到‘科举制’,标志着由尚武向崇文转变的完成。那么科举中崇重进士贬抑明经,则又标志着社会价值观由崇重经学向崇尚文学转变。这两重转变几乎是同时完成的。故唐代士族亦能与时俱进,随俗雅化,转为文学士族群体。”(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82页)

正史还是笔记小说,都有相关记载。如《新唐书·选举志》就云:“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①《唐国史补》亦云:“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文人。”^②《唐语林》、《唐摭言》等也有相似言论^③,所以《全唐文纪事》卷十五《涉史随笔》在概括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状况时干脆说:“礼部侍郎杨綰上疏,以为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近世专尚文辞,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从此积弊转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训士。”^④因此,从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我们把白居易生存哲学考察的逻辑起点放在这里,意义即在于此。这正如日本学者冈村繁所指出,白居易在“汉魏以来的绚丽自由的传统辞赋衰退的当时,专意于辞赋创作,且将其精力主要凝聚在律赋上,这样的界说是并不过分的。律赋是当时进士考试中最大的重点,是左右将来荣达的关键。或许是这个原因吧,他现存的十三篇律赋作品,大抵上都是围绕着科举考试,集中作于应试的前后十年间。尤其是《白氏文集》所载的十篇律赋作品,他的广博的学识与优越的文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些珍贵的名篇中的对偶的表现,作为应试技术的新的关键之处而被开掘出来,引起了士子们的注意”^⑤。不过,颇为遗憾的是,于此,冈村繁过于集中地注意了赋作中所展现的文才、学识及文学技巧,而忽视了赋作中所表现的儒、道互补的思维模式,以及这种儒、道互补

①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166页。

② 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第55页。

③ 如《唐语林》云:“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王谔:《唐语林》卷八)《唐摭言》也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10页)

④ 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十五《贡举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94~195页。

⑤ 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五卷《唐代文艺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19页。

的思维模式对白居易精神人格的影响和对今后人生中儒、道互补的人生模式的规约作用。关乎此,后面章节将有详细的阐述。

受早年就养成的这种开放心态的影响,白居易随后便对当时盛行的佛、禅思想也倾注了相当的热情。但是,他的这种对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容并包的人生实践,与著名理学家程颐对其兄长程颢理学思想形成过程的描述“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之六经而后得之”^①是有明显区别的。尽管白居易也和程颢一样“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但他却没有“反求之六经而后得之”的更高的终极关怀,更没有建构新的哲学理论体系的明确意识。白居易作为一个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一种合乎日用伦常的审美人生,并试图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出入儒家经典、诸子百家、方外之教,其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为了他自己当下的“用”,是为了解决现实生存中的疑难和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的这种思维模式正好代表了传统思维模式中的那种“内生证智”式的实践思维,总是希望在“躬行践履”中迅速完美地完成和实现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从而使审美情感和现实伦理得到巧妙的结合。朱子云:“学之之博,不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②这种强烈的实践特征与经验特征,是对传统思维模式的一次很好的总结。很显然,白居易的经验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想以及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求的性格倾向,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在当下最具体的表现。因此,可以这么说,白居易因为过于注重对现实生活中感性经验的感悟和体证,所以他又是一个深切的怀疑主义者。例如,白居易对道教与佛禅的信仰都是不彻底的,道教自不必说,即便佛禅,其态度有时也并不十分严肃,如“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卷第三十四,《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虚空若有佛,灵运恐先成”(卷第三十四,《酬梦得以予五月长斋延僧徒绝宾友见戏十韵》)、“佛法赞醍醐,

① 程颢、程颐:《二程集·伊川文集·明道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638页。

②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22页。

仙方夸沆瀣。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卷第二十一,《卯时酒》)、“《柘枝》紫袖教丸药,羯鼓苍头遣种蔬。却被山僧戏相问,一时改业意何如”(卷第三十五,《改业》)等,均是如此。这种深切的怀疑不仅没有使白居易生活在惴惴不安的心境中不能自拔,反而成为其表达快乐哲学取之不尽的创作和情感资源。不过,白居易这种“适用的”、“充满人道”的经验主义思想,如果仅仅从思想史的理论角度来看,它的缺陷和不足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超出传统文化中相关的思想高度。这里又一次清晰地表明,白居易对传统经典(包括佛、禅经典)的学习,也往往是停留在“学以致用”的功利层面上,只是为个体人格寻找解决生存困境的当下法门。由于时代和个人性格的限制,白居易无力也不想花费心血去超越传统的思想体系而建构一个新的体系。这一点,朱光潜法眼独具,他说:“中国人原来有‘好信教不求甚解’的习惯(笔者按:此指批判元、白信教而言),这种马虎妥协的精神本也有它的优点,但是与深邃的哲理和有宗教性的热烈的企求都不相容。”^①可见,受传统文化中经验理性的制约,白居易信教而又对宗教迷狂保持距离的姿态,也就使得他既不能成为一名彻底的宗教徒,又不能使他对宗教持完全理性的批判态度。与之相应,上述的对立统一,恰恰使得白居易在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及儒、释、道三教“世间”和“超世间”各自之间表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在他的生存哲学中,“世间”与“超世间”、“世间”与“出世间”是不即不离的,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只要稍作反照,就会清楚它是深受儒、释、道相互交通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的结果,正是这种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交互关系,使得白居易形成了一种合乎日用伦常的审美人生境界。这一点,李泽厚作了很好的述评,他说:“无论易、庄、禅(或儒、道、禅),中国哲学的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中国哲学思想的道路不是由认识、道德到宗教,而是由它们到审美。中国哲学

① 朱光潜:《诗论》第二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92页。

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孔子最高理想是‘吾与点也’,所以他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时间、人生、生命、存在有很大的执着与肯定,不在来世或天堂去追求不朽,不朽(永恒)即在此变易不居的人世中……这种审美境界和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区别于认识和思辨理性,也区别于事功、道德和实践理性,又不同于脱离感性世界的‘绝对精神’(宗教)。它即世间而超世间,超感性却不离感性;它达到的制高点是乐观积极并不神秘而与大自然相合一的愉快。这便是孔学、庄子与禅宗相互交通之处。”^①孔学、庄子与禅宗亦即儒、释、道相互交通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它们共同表现出来的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倾向,实际上要求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能够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安宁与幸福,亦即达到“中庸”这种理想人格形态,从而在人生的快乐中求得解脱与超越,这种解脱与超越,它是知与情,抑或信仰、情感与认识的融合统一体,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乐感”的文化形态。因此,归根结底,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体用不二、主客同构即既具有理性内容又保持感性形式的审美境界,而这种审美境界酿就的审美人生哲学,作为文化基因会潜在地渗透到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白居易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封建士大夫,其“乐天知命”、“执中用常”、“无可无不可”、“安时处顺、触处即真”这样一种审美人生的形成,无疑是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可供操作的最佳实例。出“自”同通“”同通“”同通“”同通“”,中学音音手同音奇,通因“黄”最后,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正是白居易这种对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容并包、出神入化的融合在己之身的良好实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203~204页。

又为宋代士大夫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考起点。^①并且这个新的起点,不仅只是对文人士大夫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是对宋代理学家来说,也有着某种启迪,这便是要想压抑佛、老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挑战,就

① 因为诸种思想学说的长期推演论争,相互融会整合,势必造成某种学说取得更为重要甚至是定于一尊的地位,但在形成这个结果以前,诸种思想学说势力的盈虚消长,肯定是一个激烈摩擦和冲突的过程,而在这个摩擦和冲突的过程当中,对思想把握敏锐的知识精英,往往表现为或激烈维护某种学说,排斥异端;或兼综各家,为己所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建构新的理论体系。白居易以一己之身,用“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卷第七十一,《醉吟墓志铭》)的独特践履,表明了自己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兼容并包。尤其是“中以释教治其心”这种由外在规约向内在自省的趋向,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带有明显的从中唐向两宋过渡的性质,但是,人,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其自身是很难觉察自己在历史进程尤其是对后世历史的作用的。不过,宋儒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却能够给予理性的认识,如朱熹就云:“及唐中宗时有六祖禅学,专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见性。士大夫才有向里者,无不归他去。韩公当初若早有向里底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274页)可见,中唐正是儒家文化由礼教仪节所形成的伦理纲常、行为规范对人的外在束缚转向为内在心灵的道德自觉这个“内转”过程的起点,对于唐宋文化的转型,葛兆光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总结性,他说:“具体到文化史、思想史研究里面来说,把唐宋连在一起研究,这种看法也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把唐宋连在一起,就可以发现和解释很多新的思想和文化历史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第一个,盛唐以后的‘孟子升格运动’,使中国儒家思想的方向,从荀子强调‘礼法’一路,转向孟子一路的‘性善’、‘良知’、‘好辩’,引起了刘子健说的‘中国转向内在’,确立了宋代重视‘内在超越’的路数,这大家都很熟悉。第二个,和上面那一现象一样,大家都知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他的《原道》开创了宋代新儒家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和历史的风气,而他的学生李翱的《复性书》结合儒释两家的说法,也把儒家的道德约束从外在转向内在,结果是一方面使佛教理论进入儒家学说,另一方面让新的儒家学说有效地超越了佛教,同时也有效地取代和抵制了佛教。过去很多人看到了前一面,但是不看后一面,所以觉得是理学帮助了佛教,这是不对的。第三个,很多人都知道,宋代有怀疑经典的风气,欧阳修怀疑《易》、朱熹怀疑《古文尚书》,但是这种风气可以上溯到中唐时代啖助、赵匡、陆淳,他们质疑《春秋》三传,这可能影响了宋代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甚至开创了宋代很有近代意味的学术风气。第四个,从唐代贞元、元和年间开始的变礼迭出、仪注盛行,大家看敦煌各种《书仪》、各种《随身宝》,其实改变了传统的、由贵族垄断的经典之礼,使长期以来礼仪与社会生活脱节,普通民众与礼仪无缘的现象得到改变,以至于影响到了宋代。”(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90~291页)因此,白居易作为中唐文化的典型代表以及其自身所表现出的文化过渡性,说他为宋代士大夫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起点,应该是合乎事实的。